

民國十三年

遼瀋書社

五月一日星期四

夏曆甲子三月二十八日

孟子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為君子三樂之一誠有味乎其言也中庸云相在尔室尚不

愧於屋漏日侍亦是此意君子惟內不慙於食影上不愧於屋

漏始能為一落一獨往獨來盡樂莫樂於此矣余居貧守

釣友朋憫其窘或以錢物濟之在義應受者費不安或

靜晤室日記

余輒內卜

諸心以為安事則受之以為無愧也昨乎則受之以不慙於食



影不愧於屋漏乎則受之夫事既出於非義則何能心安

遼陽金毓黻著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

靜晤室日記

第四冊

卷五四—卷七五

遼瀋書社

《金毓黻文集》

編輯整理委員會

顧問：金景芳 鄒有恒

葉幼泉

主編：佟冬

副主編：劉英傑 孫玉良

趙鳴岐 宋欸

編委：叢佩遠 崔國璽

范壽琨 佟鈴

陶統秀 孟東暉

張復 張有義

金毓黻學術研究

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任：金長振 李玉蘭

副主任：徐毅鵬

委員：（按姓氏筆劃爲序）

呂彬 李玉蘭

李治亭 宋欸

金家玲 周光培

袁閻琨 孫玉良

徐毅鵬 鄒明珠

趙鳴岐 劉英傑

靜晤室日記卷第五十四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

九月

一日 星期日 二十八日

午間至允滋處，遇寧君春圃兆榮，年六十四。自言年五十八歲，始從吳康民學琴，頗得不傳之秘，今日自携一琴來對客。奏之，聲泠泠然，如居深山中，聞松風謖謖作聲，誠塵俗中一可遇也。康民在北都時，從某君受琴法。十年前北大同學開會，康民鼓琴爲餘興，極一時之樂事。未幾，康民下世，以爲廣陵散絕，無復有人解此道矣。今據寧君言，從康民學琴者尚有張君子貞、祁君、馬君等十數人，斯道有傳人，康民可謂不死矣。寧君初不解音律，年幾六十，而學琴甚專，同學者皆不及，如董蘿石之於王伯安也。其琴於三十年前得於山海關市上，以銀五兩易之，又得一劍。自署其室曰一琴一劍之室，蓋於此琴理早有癖好，得琴二十餘年，始得康民傳授云。

午間偕允滋出游北陵，往返三時餘。紅蓼塞野，秋氣清疏，呼吸天光，自得佳趣。歸途視白佩珩

師疾，以方臥不晤。又往拜劉贊廷新自北省歸者。

二日 星期一 二十九日

新購得王桐齡《中國史》第四冊，叙清代道光以前事，詞理條達，奇趣橫生，閱之頗足解煩。此於歷史教本中，特辟局面者也。

夜間因心爲境擾，又患失眠，此克己未嚴所致也。伏枕作文思事，最足害腦。有時非不知守戒，特妄念雜慮忽而並集，不可遏止。心地不清，擾及夢寐，學力不至，伊誰之咎？

三日 星期二 八月初一

佑兒赴遼陽，饋孫宅物，並致一函。又致趙敬甫函。齊蓬閣來函詢事，即復。致呂督辦維東一函。

學作隸書，摹《史晨碑》，未有所得。仲賢謂初學不可臨《禮器碑》，以其結體不甚謹嚴也。《史晨》則異是，學之無病。其言良是。

晚間至圖書館訪卞宗孟，與談蒐集圖書之法，並訪王曉樓不值。

閱王氏《中國史》。近人以新組織編國史者，其善本有三：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一呂思勉《白話中國史》，一即此書也。夏氏之書僅成三冊，未及其半。其精言勝義橫見側出，實爲國史之創作。如謂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漢二君營其室。後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適一時之用耳。可謂一語破的，談言

微中，後有論者，莫能外矣。呂書之佳，前已一再言之，茲不具論。王氏之作，包蘊頗富，敘述亦詳。大抵其書長於綜比，而短於持論。其上焉者，實兼趙甌北、梁任公二氏之長，故能條理一事，明其因果。又以流利奇趣之筆出之，有了然於手，語無不盡之妙，自謂係用《紀事本末》體，蓋稱心而道也。惟其短處亦正在此，語能淺出而不能深入，文多情趣而鄰於誕妄。近人筆記於《嘯亭雜錄》、《春冰室野乘》，語多徵實，文復雅馴，采取一、二，無不可也。若《清代野史大觀》、《清稗類抄》、《清代軼聞》諸書，多不注明出處，語涉不經，且多誣蔑之詞，王氏最喜引之，而不知細爲別擇，則好奇之過也。王氏謂實錄官書，專載諭旨奏報，不足以窺見一朝之究竟。說固不爲無理，然作史者常取實錄十之七、八，而取野史十之一、二者，豈非一則信而有徵，一則妄而多誣乎？近人治學之法，其取一說必列舉多證，衡量再四，而後敢筆之於書。呂氏之書即用此法，是則王氏之所短也。

近日下筆作文，略能馳驟盡意，殆能多讀書之故。

夏穗卿曾佑論云：「綜古今之士類言之，可分爲三期：由三代至三國之初，經師時代也。經師者，法古守禮，而其蔽也誣。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也。名士者，倜儻不羈，而其蔽也疏。由唐至今，舉子時代也。舉子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應試之知，故其蔽也無耻。」此所立論，可謂包舉一切矣。惟夏氏此書撰於清季，其時考試制度未廢，故以舉子終之。若自清以迄今二十餘年，科舉廢，學校興，士子化於歐風，靡然從之，以提倡新思潮爲務，故此時代，乃學生時代也。學生者，不拘於故常，不囿於一隅，而爲新知之是求，故其弊也盲從。來日之事變不可知，而以往之士類，舉莫能外此

四者矣。

四日 星期三 初二日

聞吉甫來，往訪已行。晤白師佩珩於通志館。長城侄來自里門，述母親之病已全愈，里中亦平安。

吳向之先生贈自輯《宣德別錄》二冊，前在晉省刊行者。

近有人與總座寄一古印，茲將拓文粘附於後。

印文：統所都提控行司之印。

背面鐫小字：忠領都印。疑有誤。

得印人：鳳城縣人李景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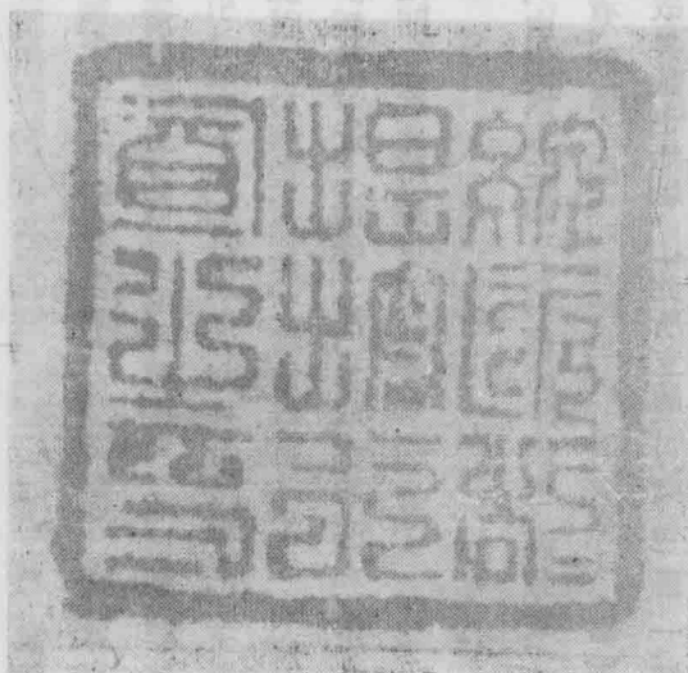
發見地：臨江縣界平水甸子。

得印情形：李君行至平水甸子，見泉一眼，渴而思

飲，俯身見水底露見印紐，紐上鐫一上字，用手撈取，

始得此印。現存張司令長官學良手。此印之概略。

袁潔丈云：前在海龍發見之摩崖，女真字也。羅叔言之少君，通習女真文字，謂上有大金收國二年等字，此金源初建國時物，彌為可寶。



五日 星期四 初三日

閱夏氏《中國歷史》。其論老、孔、墨三家云：「老子於鬼神術數，一切不取者也。其宗旨過高，非神州多數之人所能解，故其教不大。孔子留術數而去鬼神，較老子爲近人矣，然仍與下流社會不合，故其教只行於上等人，而下等不及焉。墨子留鬼神而去術數，似較孔子更近，然有《天志》而無天堂之福，有《明鬼》而無地獄之罪，是人之從墨子者，苦身焦思而無報違。墨子者，放辟邪侈而無罰也，故上下之人均不樂之，而其教遂亡。至佛教西來，兼老、墨之長，而去其短，遂大行於中國。」按所論者，頗扼其要，於寥寥短章中，而三家之長短具見，可謂能窺見至隱矣。又云：「《老子》之書有破壞而無建立，可以備一家之哲學，而不可以爲千古之國教」，此亦定論。

閱蕭一山氏《清代通史》。瞻而有法，擇言能精，所謂詞尚體要者，殆謂是歟？乍閱蕭書，似不如稻葉岩吉之作，迨細參之，則蕭作爲勝。選材精當，一也；采摭繁富，二也；摘詞安雅，三也。特稻葉爲創作，蕭氏爲因成。創作者難爲功，因成者易爲力耳。

六日 星期五 初四日

傍晚，陳信安邀便餐於玉壺春。夜偕允滋浴於浴新池，歸途遇大雨，雷電交作，車不蔽雨，衣帽盡濕。倘遲時許再行，則雨止矣。

閱夏氏《中國史》。夏氏謂中國之官制風俗，皆至曹魏而大變。秦、漢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之官隸於少府，皆用宦者掌之，其職至卑。其魏悉改用士人，其位始尊，其權始重，蓋漢之丞相與天子

坐而論政，對國家負責任者也。若魏以後，三省長官，不過爲皇帝之私人，與國家無涉，實即漢宦官之易名，非古之大臣也。古人之治之不可復者以此。兩漢之世，取士用徵辟之法，故人材盛而流弊少。至魏文時，立九品官人之法，於是不辨賢愚，只憑門閥，而氏族之別遂嚴，風俗亦因之一變。按此所論，皆極精湛，所謂俟諸百世而不惑，實諸後世聖人而無疑者也。魏、晉以後，以望族爲士，平民爲庶，此二字屢見南北朝人口中。其時士庶之見，深入人心，蓋九品官人之法所致也。夏氏又曰：氏族之習，蓋萌芽於魏之九品中正，而殄滅於隋之進士科。其始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皆出於政治上必然之效果，非空言所能爲也。

七日 星期六 初五日

晉人王孝魚永祥，頗究哲理，昨舉鍾泰所著之《中國哲學史》以告，謂爲近日出版界之佳製。余亟借而讀之。開卷之後，不忍釋手，則是書之佳可知也。金松岑天羽叙其書云：「鍾山泰之字富於理性，純於學。其爲書立例謹嚴，愜乎獨肩砥柱東流之責，可謂憂世之深矣！」所評至當。又云：「鍾山之擇術焉醇，其觀古焉涵泳反覆，久而得其通。」此尤非虛譽也。以余觀之，鍾氏之學，蓋由宋學入，主程、朱，而亦不廢陸、王，故於清儒取孫夏峰、陸桴亭、李二曲，其次則取王船山、張楊園，而陸稼書則入附傳，且曰稼書實非桴亭比，其宗尚所在可知矣。

余於清儒，極心折稼書。以其制行、居官、講學、蒞政，皆不愧乎古人。而論學能持嚴正態度，不涉游移兩可之見，在諸儒中尤爲特出，此不可望之於桴亭、楊園諸人者也。桴亭論學，體用兼綜，固

已開顏、李一派之先。楊園踐履篤實，粹然儒者，亦與稼書爲近，然能獨善，而不能兼善。生斯世也，自淑其身，固無礙於人矣。而於儒者之志業，學問之能事，猶未盡其量也。人已兼盡，已立立人，始得聖學之全。設使桴亭、楊園與稼書易地以處，吾不知果何如也？

清代考證學，爲性理學之反動，考證學似無與於思想界。然如戴東原論性之精闢，誠講宋學者一勁敵也。鍾氏本不滿於戴東原，故名其派曰標榜漢學。梁任公喜揚漢學之濶者也，鍾氏乃曰：『無識之士，欲揚漢學已死之灰，以爲是與歐西科學相吻合。舍本逐末，泛濫無歸，吾不知所謂科學者，果如是否也！』蓋梁任公、胡適之，皆謂清儒治學方法，合於科學，故鍾氏以此攻之。抑知學問之道，相引無窮，往往懸鵠本同，祁嚮在此，而其結局適得其反，別有創獲，此始事者之所不及料也。如惠、戴諸君，由詁訓以求義理，雖與治宋學者操術不同，而其趨則一。迨研討既久，條理日密，詁訓之學，遂成專家。其所用之方法，乃與今世之科學方法暗合，此誠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矣。吾人謂其汲流忘源，失立論之本旨，則可，謂其無功於學術界，則不可也。

清代諸儒，若顧亭林，若戴東原，若顏習齋，或爲一代學術之開山，或自辟畦町以別樹一幟，皆不愧爲思想界之代表。即彭尺木、羅臺山諸人，採儒、釋爲一途，明目張膽以言之，亦足自成家言，代表一派者也。惟唐鑑萬之撰《潛書》，洪北江之撰《意言》，胡石莊之撰《繹志》，雖能連結篇章，依倣諸子，乃爲一時輿到之作，非有深根寧極之論，與一世之人心學術，絕無影響，不憚煩而述之，亦何爲哉？至於龔定菴、曾滌生兩氏，一則踔厲無前，一則實大聲宏。其能左右一世者，特文學耳。龔氏有

《著議》，曾氏有《原才》諸篇，於理道之論，頗申己見。其爲一時興到，與唐、洪、胡諸君略同，而亦與以思想界之地位，竊未見其可也。

大抵鍾氏喜談宋學，故於夏峰、桴亭、楊園、二曲諸先生之說，皆津津樂道。而曾文正固喜尊揚宋學者也，故亦樂而引之，以殿清代思想界之末，其用意不可知乎？孝魚近擬撰《理學末流之反動》一文，曾舉目次示余，中有今文學一章。清代之今文學，殊有極大之影響，取而述之，得其要領矣。多言多求，只自取辱，嗣後外人有事干請，而無關事理之大者，一概拒之。養天趣，保令名，胥不外此。

八日 星期日 初六日

閱《中國哲學史》。治學不可有成見，有成見則有所蔽，挾入主出奴之見以衡古人，而真理晦，此成見之不可有也。著書不可無成見，無成見則書自書，我自我，散無友紀，莫可條理，使讀者迷於嚮往矣，此成見之不可無也。往者謝無量氏撰《哲學史》，連篇累牘，但錄成說，讀未終篇，令人思睡，此無成見故也。胡適之之《哲學史》，好下己意，失之武斷，未必盡當人意，然每爲讀者所喜，此有成見故也。蓋治學貴虛心，博涉百家，滙容衆流，非虛心無以受之，此古人博文之說也。著書貴有簡裁，斷制謹嚴，有取有舍，若悉數之，則不能終其物，此古人約禮之說也。鍾氏之書，尊程、朱以殊號，鄙漢學爲標榜，成見亦未盡捐。亦惟其有成見，所以勝於謝氏之作也。閱鍾氏書，自近代起，由此上溯於古，沿流尋源，亦一法也。

傍晚同清溥赴南滿醫院視鐵珊疾，出院後餐於民九飯店。

恪守知止之念，勿萌貪進之心，持此自厲，庶無咎乎？

九日 星期一 初七日

鍾氏之論周濂溪曰：「周子致廣大而盡精微，正以雜於二氏之故。雜於二氏，於周子何傷乎？而疑者既疑乎其所無庸疑，諱者又諱乎其所不必諱，以是雲霧旁興，轉生障翳。」又曰：「異端正學之見，未有不愈講而愈紛者。」又泛論曰：「宋儒何以能邁於古人，以大有得於二氏之教。彼始有見於佛、老之理，既反索於六經，而亦得之，且又應有盡有，一無欠缺也。於是自有家寶，而不必於他求。故其闢佛闢老，非以讎之，以爲實無需乎爾。此正宋儒善用儒老之長，而無佛老之弊，豈與昌黎《原道》之空言攻訐而欲火其書、廬其居者同乎？」

按此所論，實至精，亦至平。宋儒之異於漢儒者以此，宋儒之卓出一世者亦以此。嘗謂宋儒之性理學，與清儒之考證學，其操術也本同。其始也，一以尊揚孔、孟，一以發明漢學，非有意求過古人也。迨研討既久，結局乃異。其議論固不求異於古人，而精神則別具一面目，此亦時代爲之也。顏習齋力攻宋儒言心性之不合於古，實由未能徹悟此理，即顧亭林《論學》一書爲針砭末流而發，亦爲未達一間。蓋吾國學者，向來標一崇古尊孔之目，兢兢然而不敢越。宋儒言心性，揭藥孔、孟，而實異孔、孟，不待辨矣。即習齋力主直接孔子，博乎六藝，日教人習禮、樂、射、御、書、數，亦豈適於今日之用乎？惟宋、清諸儒日言崇古，而不泥於其迹，泛濫百家，博觀約取，終以成其一家之學，此真所謂善

學古人者也。

吾國學者，以祿代耕，自古已然。孔子爲乘田委吏，此爲貧而仕也，正不得假學以致用之名，必以出仕爲爲政也。程明道先生，三代以後之賢人君子也，年二十六中進士，調鄆縣主簿，改上元縣，遷晉城令，熙寧初，以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後以不附王安石，改簽書鎮寧軍判官，遷太常丞，知扶溝縣，已坐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跡明道之一生，未嘗稍離於仕宦，然仍不失爲澹泊明志之士，更能以聖賢之學自淑而淑之人人。此何故也？古人之以祿代耕，亦因仕求學，學與仕不相妨，不必若今人之好爲高論，必遠於仕宦，遷跡山林，始予以君子之名也。且唐宋之官，名與實違，員秩冗雜，往往有官無職。君子居是官也，有讀書之暇，無尸位之譏，亦何樂而不爲乎？至有清一代，始多淡於仕宦之士，顧、黃、王、李諸賢，心懷故主，茹痛已深，甘老山林，絕迹軒冕，此無可如何之事也。至若錢曉徵年甫四十，即絕意仕進，姚姬傳列名郎署，即謝病而歸。以二先生之學之名，非不可以躋顯要、樹豐功，而不爲者，非有所薄於此也，蓋別有可樂者在耳。況其時在野之賢，不仕亦可得祿，其途有二：各省各縣，書院林立，朝脫朝衫，夕致聘金，修脯甚豐，不必入仕，一也；漕督運使，富擬愷、崇，觴咏無虛，延賢恐後，或刻叢書而藉以壽世，或購成稿而易以己名，入其幕者，月得之豐，尤不下於仕宦，故士子樂而就之，二也。清代之情形若此，故通籍之後，不汲汲於仕進者，正大有人，此時代使然也，又未可以唐、宋之往事而一概論之矣。

吳檢齋承仕云：「古人謂青出於蘭，非謂蘭、青皆色，蓋蘭草名也，可以製靛，染物使青，故曰青出

於蘭。蘇子瞻不知此理，而作論非之，蓋失之矣。其論甚當，而蘭非色名，尤爲聞所未聞，書之不可不多讀者以此。

借一抄本《契丹國志》，與掃葉山房《四朝別史》本對校，兩書之異文甚少。抄本奪誤脫落之處甚多，不盡可據。然亦有抄本有而刊本脫落者，又刊本每易夷爲裔，則有所忌諱而改之也。余尚有一本，鐫莫子偲收藏印，覓之未得。晚與允滋飲於市上。

十日 星期二 初八日

日來秋高氣肅，日暖風和，爲一年最佳之時。煮茗讀書，如與古人晤對於几席之間，此真人生難得之樂也，豈可草草度過！念自銜恤以來，罹痛既劇，遭境多乖，每一展卷，則心神不攝，每一下筆，則詞氣不屬。試觀第五十三卷之日記，每日草草了事，蹇澀不能成詞，遂疑馬齒日增，江郎才盡，從此不堪理書生故業矣。入秋以來，收神斂氣，心不外放，漸能提起精神。溫習故書，下筆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累千萬言而不能止。始悟曩者之蹇澀，乃因神志全亂所致，非才之果盡也。讀書與交友同，朝夕晤而之友，切磋研習，其情何若！若久不接晤，胡、越千里，一旦相值，且有不能舉其名字者矣，此習與不習之故也。作文始於造意，終於遣詞，有意而得有詞，因詞轉以生意，意已定而辭不屬，此不多讀書之過也。多讀書則與詞相習，相習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又有何詞之不能立，何意之不能達哉！故爲學之道，始於收放心，成於多讀書。

李生顯富在帖估中得一後魏碑拓片，額曰《大魏故介休縣令李明府墓志》。序云：君諱謀，字文

略，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十世孫，大魏青州刺史貞侯之第二子也。按此碑已見《匄齋藏石記》卷七，考證甚詳。魏時選士，承用九品官人之法，極重門第。遼東李氏本爲望族，故其子孫雖移居他郡，仍係以本望也。李明府卒於洛陽，葬於齊郡安平縣。此志石出於山東安邱縣，蓋已著籍於山東矣。錄稱書勢秀逸，不在司馬晒、劉玉之下。細驗拓本，語蓋不虛。校《契丹國志》一卷餘。

十一日 星期三 初九日

曩者余愛讀周子《通書》，以爲醇雅如古經傳。又喜誦張子《西銘》，以爲深博如《易繫》。今閱鍾氏之書，復誦此文，穆然悠與古會。周、張二子之卓然特出，誠非偶然也。宋儒如周、張、程、朱諸子，皆長於文章，明道之言性書，朱子之封事，皆爲千古至文，《通書》、《西銘》尤其杰出者耳。歐公、東坡以文章名於一代，然於其集中，求如《通書》、《西銘》之作，實無有也。世只知周、張二子爲理學大師，不知其文學之無稱，特爲理學所掩耳。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抄》，始以此二文入選，而極稱之，其識可謂卓絕矣。

《宋史》以道學、儒林分傳，清賢多議其非。清陳黃中撰《宋史稿》，合而爲一，錢官詹曉徵亟稱之。鐘氏獨謂《宋史》之傳道學無可議，其可議者特於例有不純耳。史、漢之儒林傳，本爲傳經而設，故其所叙列，但及六藝授受本末而止。宋之諸賢，固不能以傳經之儒盡之。宋儒與漢儒，其取於孔子之經則一，而所以取於孔子之經則有間，譬之於穀，孔子植之，漢人收穫之，宋儒則播之，磨之，浙之炊之，且以自食之者也。然則特創道學之傳，以位置此數君子，豈得爲過耶？然象山與晦翁其學

皆出於程氏，而晦翁在道學，象山在儒林。季通、仲默與直卿、公晦皆學於晦翁，而二蔡在儒林，黃、李在道學，此則於例有不純者也。」

余謂宋儒道學之精神，異於漢儒，而清儒樸學之精神，亦異於漢、宋諸儒。修《宋史》者，於宋儒別立一傳，修《清史》者，於清儒獨不可別立一傳乎？此立說之不可通者也。章實齋嘗謂古人作史有立專傳之法，所以位置特異之人物，此法至善。周、程、張、朱諸子，爲一代卓出之人物，列之儒林，適見其小，不妨別立專傳，如《漢書》之傳董仲舒、楊子雲，又於儒林傳中略叙授受梗概，則無可議矣。余考柯維騏《宋史新編》，已將二蔡列入道學，獨象山仍在儒林，以明人存尊朱卑陸之見故耳，非能以鍾氏之見而細爲之分疏也。

校《契丹國志》，共校四卷，一寫本，二承安堂本，三掃葉本，以承安本爲善，抄本訛字最字（多）。余前言承安本有莫子偲印，非也。有莫氏印者，《大金國志》也。

十二日 星期四 初十日

吳向之先生云：「《契丹國志》實爲葉氏所撰，在《遼史》之前，或謂爲僞託者，誤也。」校《契丹國志》數卷。新羅貢遼禮物有成形人參、無灰木刀櫛。人參之大者有種種形，或似人或似物，故謂之成形；無灰木，蓋木之一種，質最堅者，櫛即柄字，今方音仍讀如霸，或作把，非也。契丹回賜物件有散馬，疑即今之馬，牡馬之加以割治者。西夏國貢物有沙狐皮，今北省呼狐皮之不佳者曰沙狐皮。諸國貢獻有寶鐵兵器，寶鐵即鑛鐵。鑛鐵爲遼，遼所以名國也。

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有樺皮纏、蜜漬山果、榛栗、松子。今吉林省產樺皮，可以蓋屋。今以皮墊馬鞍曰皮纏，纏去聲，時以樺皮爲纏，故名。今有蜜漬山楂，或山里紅，果之一種，即蜜漬山果也，此法遼時亦有之。以上所述，皆古名之可通於今者，資博聞，便考證，故詳舉之。

契丹五京，以臨潢府爲上京，大定府爲中京，燕京爲南京，雲州爲西京，遼陽爲東京，此考諸《遼史·地理志》而可知也。據《契丹國志》云：「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古肅慎地也，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按此即渤海之上京龍泉府，今寧安縣境之東京城也。考本志所記五節度熟女真部族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又熟女真國西至東京二百餘里，生女真國西南至東京六百里。以今日道里約略考之，所謂東京，皆指渤海上京而言。蓋遼初以新得之渤海國都爲東京已無疑義，後東丹王移治於遼陽，並徙渤海國人於此，遂以東京之名亦加之於遼陽矣，此後日之東京也。若立東京之初即在遼陽，何以所記道里皆不相符，生熟女真皆去遼陽有千里之遠，而以五、六百里當之可乎？葉氏宋人，記異國事或有傳聞之誤，洪忠宣固居北庭多年者也，亦以渤海故都爲東京，耳濡目染，豈有錯誤？況遼初以遼陽爲南京，當時數京並建，必別有東京，以地望准之，亦以渤海故都爲當。然則今土人呼渤海上京舊址爲東京城，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復商庚普函。致朱吉甫函。薦劉贊廷於蓋平稅局，今日持函前往。

十三日 星期五 十一日

日來風暖氣和，不異初秋，本擬北行，以近節而止。